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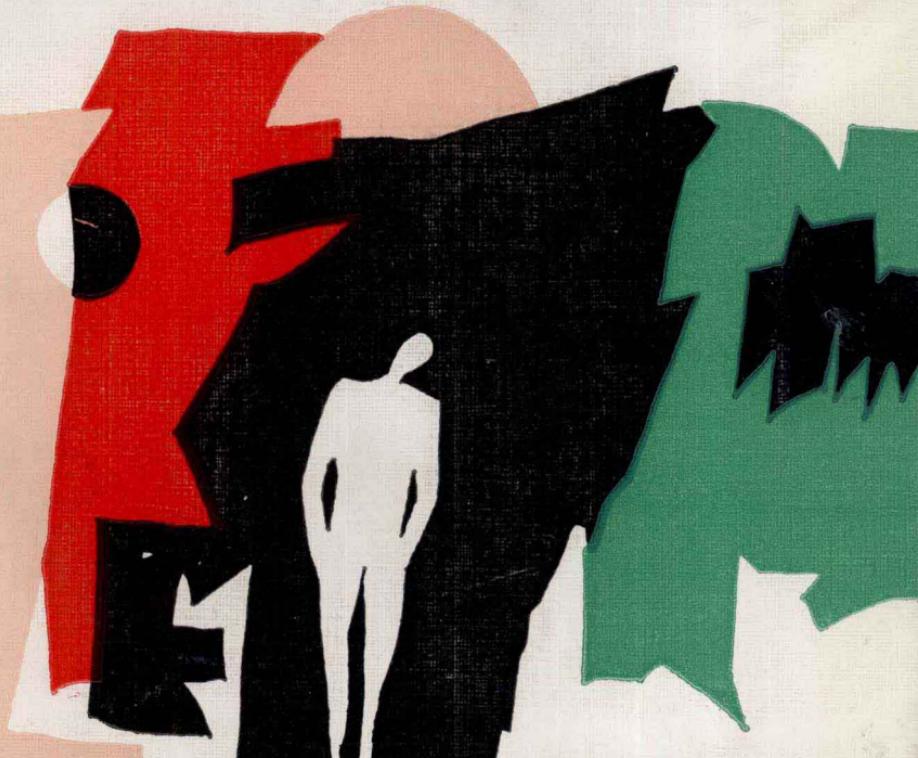
弗里施

小说戏剧选

(瑞士)马克斯·弗里施著

蔡鸿君 选编

(上)



弗里施 小说戏剧选

(瑞士)马克斯·弗里施著

蔡鸿君 选编

(上)

安徽文艺出

内 容 简 介

马克斯·弗里施是当代瑞士最著名的德语作家，著有多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在德语世界中影响深广。本书是弗里施的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选集，收有作者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戏剧作品九种。其中《蒙托克》是带有大量自传成份的小说，描写了他初恋的情人、两次婚姻的失败以及与奥地利女诗人的感情纠葛等。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自己也认为这是一部“说真心话的书”。剧本《毕德曼和纵火犯》塑造了一个既唯利是图，又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的人物形象，喻示和警告人们对邪恶势力不进行抵制和斗争，一味妥协忍让，试图用仁慈之心加以感化最终必将招致大祸。《安道尔》是弗里施的又一部剧作。作品通过一个打上“犹太人”印记的青年人的遭遇，不仅揭露了纳粹法西斯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罪恶行径，而且深刻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这一深层主题。

马克斯·弗里施的生平与创作

蔡 鸿 君

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 1911—1991)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瑞士德语作家之一,他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被人们视为战后瑞士德语文学的象征。

身 世

马克斯·弗里施于1911年5月15日出生在苏黎世市霍廷根区一个建筑师的家庭。关于他的祖先,作家本人曾经这样写道:“十九世纪的某个时候,大约是在戈特弗里德·凯勒^①的成熟时期,一个年轻的单身汉跨过了瑞士和奥地利的边界,他的职业是皮革匠,想在这里找工作。他在苏黎世和一个小市民的女儿奈格丽结了婚,他们生养了几个儿子。这些儿子后来入了瑞士国籍,其中一个成了建筑师。大约是与此同时——这正是瑞士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面包师的儿子从符腾堡^②来到这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入了瑞士国籍,和一个姓舒特黑斯的巴塞尔姑娘结了婚。后来,他在苏黎世当了画家和教授艺术,同时生养孩子,但全是女儿。二十世

① 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著名作家。

② 德国地名。

纪初,这些巴塞尔女儿们中的一个和那些苏黎世儿子们中的一个结了婚,他们继续生儿育女,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我……”^① 马克斯·弗里施的父亲名叫布鲁诺·弗朗茨·弗里施,依靠自学成了建筑师;母亲卡洛琳娜·贝蒂娜(娘家姓魏德穆特),曾经在俄国当过保姆。马克斯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年长8岁的同胞兄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亲作为建筑师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做房地产生意。那时,他们家经常靠举债度日,甚至到他的父亲去世时都未能还清债务,后来由他的哥哥继续偿还。为了填饱肚子,母亲在秋天经常带着小马克斯去树林里捡落在地上的水果。在自传体小说《蒙托克》里,作家通过叙述一些家庭琐事,反映了他小的时候家中的生活情形。

青少年时代

尽管家境不佳,弗里施的少年时代总的来说还是轻松愉快的。1924年至1930年,他在苏黎世州立实科文理中学读书,他称自己不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一直到毕业也没有在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在中学时代,有一个被弗里施称作W君的同学曾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十年之后,他在《蒙托克》一书里称W君是他当时“唯一的朋友”,并且写道:“我在各方面都无法与他相比。在班级里,他一直是尖子,但并不追求虚荣。他比别人聪明,但他没有因此而放松懈怠;他学得还是非常认真,一旦老师表扬他,他反而感到难堪。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好学生的楷模,他会故意对老师非常无礼。放学后我陪他回家,尽管我要绕许多路,但我觉得是一种收获,因为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尼采、奥斯卡·瓦尔德、施本格勒和叔本华。他父母很富有……他有着哲学家的气质。我对他脑袋瓜

^① 《马克斯·弗里施全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76年版(下简称《全集》),第五卷,第398页。

里能想出那么多的东西只能感到惊讶。他也很有音乐天赋，而我对此一窍不通。他曾花了几晚上的时间让我听巴赫、莫扎特、安东·布鲁克纳以及其他一些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音乐家的唱片。他说，没有一个人会完全没有音乐细胞。……他鼓励我去学绘画。在这方面，他认为我不是没有天赋。他对美术的判断力也不同凡响。……他父母家的花园里有个私人网球场。因为我相当穷，W君送给了我一副他用过的网球拍，以便我们可以一起挥拍对打。他打球根本不为输赢。他打得比我好，我能向他学到教练教他的东西。但他还教我更多的东西：他教我输球，教我打球不是为了得分。……通过他，我知道了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和柯罗，后来又知道了毕加索和非洲的面具。在这种场合，他从来不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从不卖弄自己所知道的许多知识。”^①

弗里施的父亲，当年作为皮革匠的儿子无钱就读专科学校，依靠自学成了建筑师，“他自然愿意看到他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认为这是荣耀的事情”^②。因此，弗里施的哥哥选择了化学专业，后来成了化学家。从小爱读《堂吉诃德》、《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弗里施，后来又迷上了戏剧，几经尝试均无结果，只好顺从父亲的意志，参加自认为是“多余的”、“可笑而又庸俗的”中学结业考试，然后进入苏黎世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大学的两年对弗里施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走廊上，心情总是不平静，总是充满着期待，感到寂寞，办事冒失，缺乏自信心，大部分时间堕入了情网，而那些姑娘对此却一无所知。”^③ 作为主攻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弗里施却“以真正的热诚去探讨抽象的哲学……觉得更实在、更接近于人生秘密的是其他一些讲座”^④。1932年春，

① 《全集》，第六卷，第636至639页。

② 《全集》，第二卷，第584至586页。

③ 《全集》，第二卷，第584至586页。

④ 《全集》，第二卷，第584至586页。

弗里施的父亲因病去世。尽管一位教授为他搞到了一笔每年 800 瑞士法郎的奖学金，但弗里施还是中断学业，去当了记者，为许多报刊撰稿，他想以此证明自己可以自立。

年轻记者

弗里施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16岁的时候，他在看了席勒的《强盗》这出戏之后，写了一部题为《钢》(Stahl)的剧本，并且寄给了大名鼎鼎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 (Max Reinhardt)。上大学时，他尝试过写诗和小说，也写了一些书评、剧评。1931年5月27日的《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面部表情总谱？》(Mimische Partitur?)，评述了一次戏剧艺术展览。父亲去世之后，21岁的弗里施不得不“想办法挣钱糊口”^①。他选择的谋生职业是为报刊撰稿，“去报道被指定的一切：节日游行、关于菩萨的报告、焰火、次等讽刺短剧、火灾、游泳比赛、动物园里的春天”^②。除了新闻报道之外，他还写书评、剧评、小品、杂文等。1933年，弗里施第一次出国采访，赴布拉格报道世界冰球锦标赛。采访结束之后，他游历了匈牙利、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黑海、君士坦丁堡、希腊、卫城等地。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依靠稿酬生活，常常因为囊中羞涩，每天只能依靠旅馆免费提供的一顿早餐果腹。但是，这次旅行对弗里施来说也很有收获，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尔克·莱因哈特》(Jürg Reinhart, 1934)。这是一部自传成份很多的小说，主人公于尔克·莱因哈特是苏黎世的一个年轻记者，为逃避没有爱情的婚姻，独自来到海滨度假消夏，住在一个小旅店里，依靠给国内报刊撰稿的微薄收入为生。在此期间，他与身边的3个女人（从荷兰来此度假的伯爵夫人、旅店女佣

① 《全集》，第二卷，第586页。

② 《全集》，第二卷，第586页。

希尔德、旅店老板的女儿伊尔莎)发生了爱情纠葛,最后以他的逃离宣告了这段爱情的结束。弗里施的第二部小说是1937年发表的《寂静中的回答》(Antwort aus der Stille),写的是一个市民家庭破裂的故事。同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并附寄了一册《寂静中的回答》,以期引起这位大作家的关注。对于这部小说,弗里施本人很不满意,1976年出版《全集》时没有同意将其选收进去。

建筑师

文学领域的尝试并未给年轻的弗里施带来突破,枯燥辛苦的记者生涯也越来越使他感到厌倦。1936年,弗里施在昔日的中学同学W君的鼓励和赞助下,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攻读建筑学。对选择建筑学这一专业,他曾经在给赫尔曼·黑塞的信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现年26岁,在父亲去世之后不得不放弃了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业,为报刊工作了几年,直到我终于发现这不可能是一种职业。我几经踌躇之后作出决定,再去学习另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通用的职业,即建筑师的职业。”进了联邦工学院之后,弗里施几乎完全停止了写作,不久又下决心彻底与文学绝缘,“烧掉了所有写过的和没有写过的稿纸,结束了错误的希望”^①。W君每年4000瑞士法郎的慷慨资助,使得弗里施“不必考虑如何挣钱养活母亲和自己,相反,可以演算高等数学”^②。1941年,弗里施经过5年的埋头苦读,终于结束学业,获得学位证书,随即进入建筑行业工作。1942年初,他在苏黎世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设计比赛中一举夺魁。同年7月30日,他与同事康斯坦泽·封·迈恩布尔克结婚。在这一年里,弗里施还创建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

① 《全集》,第四卷,第207页。

② 《全集》,第二卷,第587页。

所。1946年初，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的建设计划终于开始付诸实施，弗里施作为设计师整天埋头于这项工程。除了外出旅行，他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建筑设计事务所或工地。1949年7月18日，这个耗资450万瑞士法郎的露天游泳池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1月，弗里施关闭了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从此专门写作。关于建筑师的生活经历，作家在《蒙托克》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重新写作

“暗自立下的永远不再写作的誓言，有两年之久基本上没有违反，直至我在战备动员日应征加入炮兵。那时我确信战争不会对我们留情，生还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于是便又开始写日记了。……由于度假而中断了的日记后来发表了，标题叫《面包袋纪事》(1940)。”^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瑞士作为中立国也在全国进行战备动员，准备抵御外来侵略。大学尚未毕业的弗里施于1939年9月3日在提契诺宣誓入伍，此后又数次应征服役。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个士兵的笔记》，这就是后来出版时易名为《面包袋纪事》(Blätter aus dem Brotsack)的那本书。

对文学的依恋终于使弗里施彻底放弃了“永远不再写作的誓言”。194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又题：难以相处的人们》(J'adore ce qui me brûle oder Die Schwierigen)^②，这部小说是《于尔克·莱因哈特》的续集，同样带有自传成份，如主人公放弃写作、焚烧文稿等情节完全就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主人公莱因哈特在国外旅行中与伊芙妮相爱，并将她带回瑞士。两人关系破裂后，他又结识了年轻的女艺术家霍尔滕泽。然而，这两次爱

^① 《全集》，第二卷，第588页。

^② 作者在1957年再版此书时，删掉了原书的第一部分，并将书名改为《难以相处的人们，又题：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

情并没有给莱因哈特带来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他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最后以自杀结束了一生。

寻找自我，追求现实生活无法满足的目标，也是弗里施第一部小说《彬，又题：北京之行》(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 1945)的主题。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幻想的旅行，主人公在漫游了他的梦境、愿望和内心世界之后，重新回到他的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北京，既是主人公心目中十分熟悉、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一个在万里长城之后、并非确定的、幻想出来的城市，它只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地名，代表着幸福和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它似乎近在咫尺，但却永远也无法达到。《彬，又题：北京之行》是弗里施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彬(Bin)的名字是典型的中国人名的拼写方式，他是小说的叙述者“我”的幻想人物，是“我”的化身。在德语中，“bin”是动词“sein”(存在)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的变化形式。Ich(我)和 bin 连在一起，意即“我存在”，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我”和“彬”是一个整体，二者只有同时出现才能存在。“我”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彬”则代表着“我”的梦幻和愿望。作者采用这种“我”的双重结构，打破了时空限制，将真实和梦幻、回忆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表现手法在作者以后的小说中常被采用。

两位朋友

在弗里施的创作道路上，有两个人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德国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德国出版家彼得·苏尔坎普。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是世界闻名的德国作家，尤其是他的叙事戏剧和辩证戏剧理论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纳粹时期，他被迫流亡国外，1947年因在美国受到政治迫害迁居瑞士苏黎世。11月的一天，弗

里施在苏黎世话剧院艺术顾问库尔特·希尔施菲尔德的家里初次见到布莱希特。此后，两人经常一起谈论政治、人生、社会、文学、艺术。弗里施尽地主之谊，向布莱希特介绍苏黎世，陪他参观工人住宅区、医院、学校。弗里施还热心为布莱希特组织作品朗诵会，向听众和读者介绍这位流亡作家的创作。当时，弗里施正负责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的施工，他曾把布莱希特领到工地参观，两人还常常去苏黎世湖游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里施和布莱希特交往频繁，弗里施经常将刚刚完成的作品拿给布莱希特看，请他指正，布莱希特也曾将他的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戏剧小工具论》的手稿给弗里施看，听取他的意见。他们的交往对年轻的弗里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戏剧大师对问题的透彻分析常常使弗里施产生面对“巨人”的感觉，布氏叙事戏剧理论对弗里施日后的戏剧创作影响深刻，在许多剧作中，弗里施都自觉地运用了布氏戏剧的一些形式和表现手段，以期产生“间离效果”。弗里施曾多次撰文谈及与布莱希特的交往以及对布氏戏剧的看法，1966年写的长文《回忆布莱希特》，追忆了自1947年11月初识直到1955年9月在柏林绍斯湖路布莱希特住所的最后一次会面。

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 1891—1959)是德国著名出版家，1891年3月28日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奥尔登堡一个木匠的家庭，曾在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辍学，战后尝试文学创作，写过剧本和小说。1919年在达姆施塔特结识布莱希特，两人在戏剧方面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他经布莱希特推荐去柏林乌尔施坦因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33年初任费舍尔出版社著名文学刊物《新评论》主编，1936年又主持费舍尔出版社全面工作。在纳粹统治时期，苏尔坎普设法躲过检查，出版了许多被纳粹政权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据统计，在1933年至1944年被纳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443名作家中，就有123人在苏尔坎普主持工作时在费舍尔出版社出

过书。为了出版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苏尔坎普与纳粹书报检查机构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1941年12月方获许可。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精神》被认为是抵制纳粹的一本书，引起纳粹宣传机构的不满，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曾下令查封费舍尔出版社。1944年4月13日，秘密警察以“叛国罪和谋反罪”逮捕了苏尔坎普，不久关进了集中营。战后，苏尔坎普投身振兴德国出版业，率先获得柏林占领当局的出版社许可证。1947年11月，在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卡尔·楚克迈耶的《魔鬼的将军》首演时，弗里施结识了苏尔坎普。这时正在积极筹建出版社的苏尔坎普，对弗里施的创作很感兴趣，而弗里施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众多的德国读者所接受。1950年7月1日，当苏尔坎普出版社正式成立时，弗里施和赫尔曼·黑塞、布莱希特等人一起成为该出版社第一批德语作家。同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946—1949年日记》，从此，弗里施的绝大多数作品均由该出版社负责出版。1959年3月31日，苏尔坎普病逝，弗里施撰写了题为《彼得·苏尔坎普》的纪念文章，追述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这位出版家的情形。苏尔坎普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Siegfried Unseld)继续与弗里施保持密切关系，对他的许多作品得以问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两本日记

日记是弗里施文学创作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对作者的小说和戏剧提供了最好的注释，而且由于它丰富的内容和别具一格的形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弗里施的日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日记，这里没有关于妻子儿女的私人事件，作者笔下记载的是旅行见闻和感受，对事件的思考和议论，故事甚至短篇小说和剧本，人物素描，作品构思等，展示了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

深刻思索和理解。

《1946—1949年日记》(Tagebuch 1946—1949, 1950)被称作弗里施全部创作的核心。作家本人也在1958年新版《1946—1949年日记》出版时给出版家苏尔坎普的信中写道：“现在，在《施蒂勒》和《能干的法勃尔》出版之后，这本书对于读者显然完全不同了，这我也可以想象，读者将更乐于接受一本《日记》，因为这本《日记》为许多东西提供了一把钥匙。”《1946—1949年日记》反映的是欧洲战后初期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第一部分曾于1947年以《与马里翁的日记》(Tagebuch mit Marion)为书名出版，记录了作家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为战后初期的欧洲描绘了一幅别具一格的图画。这本日记也记载了作者本人的生活轨迹，这些日记不是写在旅行途中，便是写在下班之后，许多是在他经常光顾的两家咖啡馆里完成的，这就是苏黎世利马河码头附近的露台咖啡馆(Café de la Terrasse)和奥德翁咖啡馆(Café Odeon)，这里曾经是当地文艺界人士聚会的重要场所。在日记里，弗里施涉及最多的是文学艺术，他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阐述自己对文学、艺术、戏剧、表演等问题的见解，记录了与一些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为研究作家早期的文艺观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本日记也为研究弗里施日后的创作，尤其是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材料，诸如《中国长城》、《安道尔》、《毕德曼和纵火犯》等题材均在这里最早见诸文字，《奥德兰特伯爵》在《1946—1949年日记》里甚至就是一部完整的剧本。

《1966—1971年日记》(Tagebuch 1966—1971)发表于1972年，这时的弗里施已经是蜚声德语文坛的瑞士作家，他的几部代表作，如长篇小说《施蒂勒》、《能干的法勃尔》、《我的名字是冈滕拜因》，剧本《中国长城》、《毕德曼和纵火犯》、《安道尔》均已问世，并且在读者中间和评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作者在日记里既是作为一个知名人士来观察自己，同时也作为时代的见证人记录现实生活。这本日记记载的时间正是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欧美大学生运动，

妇女解放浪潮，世界性反美侵越的示威游行，布拉格之春以及紧随其后的华约军队入侵捷克等重要事件均在弗里施的日记中得到了反映。在形式上，第二本日记更加多样化，作者又增加了报刊或电台新闻摘录、统计数据、自我提问、自我审讯等新的体裁，涉及的问题很广，包括时政、友谊、婚姻、女人、金钱、祖国、文学试验、文学与暴力的关系等等，多处还出现了大段的英文。人物素描是这本日记中最为精采的部分，尤其是对布莱希特、君特·格拉斯、伊尔娅·爱伦堡等同行的回忆，以及对自己作为美国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的客人在白宫作客的追记。《1966—1971年日记》被认为是弗里施对自己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总结，剪辑、摘录等形式和老年、死亡等主题为作家晚年的创作提供了预测。

舞台上的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德国文艺界人士从纳粹统治的德国流亡到苏黎世，苏黎世话剧院成为聚集德国剧作家和演员的一个中心。在奥斯卡·魏尔特林(Oskar Walterlin)任经理，库尔特·希尔施菲尔德(Kurt Hirschfeld)任戏剧顾问(后继任经理)期间，苏黎世话剧院上演了许多有反战精神的德语剧作，如席勒的《威廉·退尔》、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等。1944年夏，希尔施菲尔德在读了弗里施的《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又题：难以相处的人们》等散文作品之后，鼓励他尝试写写剧本，并且允许他观看剧院的排练演出，以便熟悉戏剧技巧。两个月以后，弗里施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圣克鲁茨》(Santa Cruz, 1944)，翌年初，又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他们现在重展歌喉》(Nun singen sie wieder, 1945)。前者借一段三角爱情纠葛反映了异化的人类这一主题，在表现手法上超越时空限制，在舞台上展示了过去、现在、未来；后者是一部反战主题的作品，作者把舞台作为道德法庭，通过

战争期间德军士兵枪杀人质的事件，谴责了战争的残酷。《他们现在重展歌喉》是弗里施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本，于1945年3月29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时值战争结束前夜，为战后初期德语文坛出现的一系列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起了引导作用，1946年和1947年又在德国上演，引起轰动。继《他们现在重展歌喉》之后，《圣克鲁茨》也于1946年3月7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导演是海因茨·希尔佩特。

1946年10月10日，苏黎世话剧院首演了弗里施的第三部剧作《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该剧表现的主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核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如果人类希望继续生存，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独裁专制、强权政治的统治方式。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跨越时空限制，让中国的秦始皇、古罗马的布鲁图、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以及莎翁剧中人物罗密欧和朱丽叶、花花公子堂璜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真实的、虚构的人物同台表演，严肃的主题却采用笑剧这一形式来表现，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面临危险而又荒诞奇特的世界。

《当战争结束之时》(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1949)也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剧作，着力刻画了一个与苏军上校相爱的德军军官妻子的内心矛盾，于1949年1月8日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与前几部剧作一样，弗里施的下一部剧作《奥德兰特伯爵》(Graf Öderland, 1951)也是在苏黎世话剧院首演，然而，这部作家声称倾注了很多心血并且格外偏爱的作品颇受观众冷落，以致演出不满一个月就不得不停演。

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弗里施获得美国洛克菲勒戏剧奖学金，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以及墨西哥等地逗留。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五幕喜剧《堂璜，又题：对几何学的爱》(Don Juan oder Die Liebe zur Geometrie)。弗里施笔下的堂璜与300多年来

流传于欧洲的传说截然不同，以“花花公子”著称的堂璜对女人几乎毫无兴趣，他更喜欢数字和下棋，几何学才是真正使他着迷的东西。该剧于1953年5月5日分别在苏黎世话剧院和柏林席勒剧场同时首演。

三部长篇小说

如果说弗里施最初是以舞台上的成功而一举成名的话，那么他的3部长篇小说《施蒂勒》、《能干的法勃尔》、《我的名字是冈腾拜因》则奠定了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施蒂勒》(Stiller, 1954)是弗里施作为美国洛克菲勒戏剧奖学金获得者在美国逗留期间开始创作的。作者本人当初曾称之为“一部不成功的长篇小说”，未完成便搁置一旁，后来在苏尔坎普的催促下完成。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瑞士雕塑家逃避妻子、朋友、职业、国家，侨居国外6年，当他改名换姓返回瑞士时在边界被人认出，受到拘留审查的故事。小说的前一部分通过我(施蒂勒)的自述和另一个“我”(怀特)的供词，以及施蒂勒的妻子、情人、朋友等人的陈述展开情节：施蒂勒是苏黎世的雕塑家，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曾受命单独封锁一个渡口，由于没有勇气开枪，结果被弗朗哥法西斯分子解除了武装。他在婚姻和事业上颇不如意，妻子体弱多病，夫妻生活单调乏味，依靠雕塑工作又难以维生。一系列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终于离开了祖国，漂泊到了美国。6年之后，他化名“怀特”还乡，结果在入境时被人识破，在亲友、律师、检察官的竭力劝说下，他终于回心转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小说的后一部分是检察官对施蒂勒还乡之后生活的叙述：他与妻子迁居日内瓦湖畔，依靠制作陶罐为生。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在单调、乏味、无聊、寂寞的生活中，施蒂勒又萌生了“逃遁”的念头，然而妻子却在此时因肺病去世，留下施蒂勒独自品尝生活的寂寞。弗里施笔下的

施蒂勒是一个无法适应周围环境、无力驾驭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者着力于探索人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如何解决精神空虚、心理恐惧等问题。小说出版之后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扬，认为它符合五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和文学气候，在艺术上继承了从普鲁斯特、乔伊斯到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等人长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因此有人将《施蒂勒》称作“一部站在时代高度上的作品”。但是，《施蒂勒》并未立刻得到广大读者的首肯，最初的几版均只有几千册印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家名望的增长，这部小说才逐渐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并且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第一本印数超过100万册的书。

与起初仅仅受到评论家们赏识的《施蒂勒》相反，弗里施的下一部小说《能干的法勃尔》(Homo faber, 1957)在出版之后，立刻就获得了无数读者，第一年就售出了3万册，截至1989年，发行量已突破200万册，并被译成26种外文，在弗里施所有作品中是被译成外文最多的。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主人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官员瓦尔特·法勃尔，他的使命是周游世界，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帮助。30年代，他曾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任助教，爱上了学艺术的女学生汉娜。法勃尔工作勤奋，办事机灵，积极热情，富于活力，把科学技术看得高于一切，因此被汉娜称作“能干的法勃尔”。汉娜是德国犹太人，因逃避纳粹迫害来到异国他乡。在汉娜怀孕之后，法勃尔决定和她结婚，但是赴巴格达工作的美差则对他更有吸引力。由于受到法勃尔的冷遇，汉娜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并且同意打掉肚子里的胎儿。20多年后，法勃尔因飞机故障迫降在荒野，遇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兄弟，于是改变行程，随此人一起去南美原始森林的种植园拜访老朋友，然而就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个老朋友刚刚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打乱了法勃尔的生活节奏，他改变乘飞机赴欧洲参加会谈的计划，独自乘船旅行。在船上他结识了20岁的姑娘莎贝特，她长得与年轻时的汉娜十分相象，并牢牢地